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S-17/PV.3

27 February 1990

CHINESE

LIBRARY

MAR 12 1990

大会

UNISA COLLECTION 第十七届特别会议

第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2月21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 — 继续一般性辩论

下列人士发了言：

奥迪-阿里女士

(圭亚那)

沃拉贝克先生

(挪威)

鲁宾逊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拉尔科-科司先生

(秘鲁)

顾英奇先生

(中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科姆帕拉克托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加西亚-瓦格斯先生

(西班牙)

汗先生

(巴基斯坦)

赫德先生

(联合王国)

邦戈先生

(加蓬)

上午10点10分开会

## 议程项目8(续)

## 一般性辩论

奥迪-阿里女士(圭亚那)(以英语发言): 联合国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的召开是审议在全球对付麻醉品进行国际合作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庄严的场合,如果不是令人担忧的话。在目前财政和人力资源都是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本组织会员国认为有必要紧急召开这次特别会议,并由最高级别的代表参加,这充分表明我们认识到这一局面的严重性。然而承认这一点必须是我们本届会议工作的出发点。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决非新问题;为组织国家、区域和全球防卫机制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也决非始于今日。自1961年通过《麻醉药品单一公约》至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来,我们在本组织及其有关机构中不断加倍努力,以期控制并最终消除非法贩运和使用麻醉毒品这一灾难。对于这一共同努力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总结,简单概括;然而我们的各种努力收效甚微,由此而引起的震惊和越来越严重的关注却很难概而论之。

我们所有国家和各国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毒品交易和毒品威胁的影响。无疑,我们已经看到毒品这一灾难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其势头之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对其进行制约的努力。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在不久以前,毒品问题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今天这些国家则加入了受害者的行列。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与毒品有关的各种问题极其复杂,其影响已经超越了边界范畴,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毫无疑问,对于那些财政和人力资源都十分缺乏的国家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负担尤为沉重。

我认为，我国正是这样一个负担沉重的国家。 尽管从分类角度来说，非法贩运和使用麻醉毒品尚未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但这仍然是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国内问题。 我们的资源并不充足，从而带来了种种限制，但在这些限制的范围之内，我们自觉地实施了一项方案，其目的在于遏制毒品问题的发展。 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全国性运动，依照法律对所有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严重处罚。 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教育和康复方案。

在双边方面，圭亚那还同其邻国委内瑞拉、巴西和苏里南达成了协议，以期加强禁止贩运麻醉药品的共同斗争。 我们还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同美国、加拿大、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通力合作。 我们在区域和国际各级重申我们的承诺，支持为寻求早日解决这一问题而作出的众多努力。

但是，尽管我们作出了许多共同努力，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如若没有必要的资源，这些方案和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圭亚那是一个小国，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毒品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又一威胁，因此，我们有责任加入各国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所发出的呼吁，要求及早最好是立即提供必需的资金，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执行现存的各项方案。

人们已经认识到并且同意毒品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必须采取集体的办法予以对待，加以解决。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有效参加这一共同努力的能力在目前和将来都要受到我们各自资源的限制。 在这一方面，我们呼吁发达国家向多边努力提供资源，以期对这一全球行动作出更大的承诺。

正如我在开始所指出的那样，已经为国际合作设计出了足够的框架。 我们目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把这一框架装备起来，以便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发展中小国的各种需要作出足够的反映。 例如，应当刻不容缓地加强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建立这一机构的宗旨是根据国家和区域向管制毒品项目提供资金。 该基金给诸如圭亚那这样的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益处，因此值得我们大力支持和鼓励。 同

等重要的是，我们在面临显然是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必须确保联合国系统内所有与毒品有关的各机构能够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以保证获得最佳效果。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将重点继续放在提高公众意识的运动之上，以使各国人民认识到毒品贩运不仅给他们自己的福利同时也给整个国家带来种种危险。如能正确地拟订并实施这类方案，那么将在减少需求，从而摧毁生产积极性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工作必须有广泛的参与，有政府、私营部门和各国际机构参加，动员其国际舆论的力量，同麻醉品污染进行斗争。与此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注意治疗和康复方面的各种需要，因为这对于维护一个健康和富有建设性的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预防性措施当然要耗费巨资，但是要铭记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那将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应当不遗余力地寻求必要的资源，以实施这些措施。

毫无疑问，必须持续解决贩运及其各个方面的问题，其目标应该是要控制生产中心以及消费中心之间的流通。加工和运输系统之间的联系必须中断，贩运者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为此目的，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便促进适当的立法，以阻止所有那些试图从非法贩运中获利的人。当然，这种立法必须得到足够的实施，以保证他们能成功地得到执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广泛地进行协调，以便进行执法方面的合作，应扩大执法人员在调查事宜以及方法，禁止和有关麻醉品情报方面的训练方案。

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不断变化的麻醉品使用情况，使得我们能更好地计划如何防止它们不断增长。国际麻醉品控制委员会明确指出，

“人们很少了解滥用麻醉品的实际情况、以及它们的规律和变化。举行定期的普查，对于制订针对高危险性人口的减少需求的有效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麻醉品使用情况不断恶化的中转国，我们尤其感到关切。显然，麻醉品贸易的形式千变万化，因此需要密切和不断地注视其新的运作形式。本届会

议非常及时地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审议贩运麻醉品的问题，并且扩大在解决该问题中的国际合作的范围和有效性。

在本届会议审议结束之时，我们希望能通过一项政治宣言以及一项全球行动方案。如果我们未能利用这次本届联大所提供的机会使得目前的方案具有成果，并完成现有的职责，我们的工作就不够全面，因为现有的这些方案目前因为缺少财政、人力、技术和脑力资源还无法实现，我们希望能够向联合国的滥用麻醉品控制机构和系统重新作出承诺，各会员国能够竭尽全力认捐，因为这对于在反对非法使用和贩运麻醉品的运动中实施全球方案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那些只是用勇气和信念进行作战的国家来说，应尽快地提供援助。

沃拉贝克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滥用麻醉品的问题在全世界变得越发严重。麻醉品的生产正在扩大，非法贩运正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并越发难以对付。因此，麻醉品的问题不仅对个人的健康和福利造成威胁，而且也对社会的根本基础造成威胁。

麻醉品的问题只有在分区域、区域和全球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并且由各国采取措施方可得到解决，这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挪威政府认为召开本届特别联大是极为重要的，并一再强调，他希望本届会议将能够产生具体的结果。我们联合国的会员国必须表明，国际社会愿意承担其在消除国际上存在的麻醉品灾害的责任。必须承认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我们绝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在反对麻醉品的国际运动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已经具有了适合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工具和文件。

1987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滥用和非法贩运麻醉品的国际会议是极为成功的，它确定了所有在有关领域中的重大目标，并且在其全面的多学科纲要中通过了一个广泛的战略，该纲领仍然是各国政府进一步制订各国政策需要考虑的极为宝贵的基础。在过去几十年里，各会员国已经通过了多项非常重要的公约，《1988年关于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物质的公约》便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迅速批准

和实施该《公约》，将能极大地促进国际反麻醉品斗争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挪威打算在1990年批准该《公约》。

我们每个会员国，都有基本的责任在各自的国家里采取必要的行动。因此，我们都意识到，反对非法供应麻醉品的运动只有在各国政府承诺要进行坚决和全面的努力的情况下，方可产生持久的成果。这就需要减少需求，并在防止、康复和治疗领域以及在制止非法贩运的领域中建立正常的国家机构和方案。必须集中强调减少麻醉品需求的措施。如果我们要在消除非法生产和贩运的努力中取得成功，这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国家，包括挪威都正在加强努力，并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减少本国对麻醉品的需求。正当我们越发意识到需求和供应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承认对这些问题采取多部门解决办法是必要的。因此，联合国应该在各会员国的请求下在协助他们制订各国和各区域战略中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区域解决办法的例子，我愿指出，目前北欧国家在这些领域所进行的合作。自1971年以来，北欧国家关于滥用麻醉品协调委员会一直在进行工作。该委员会的活动包括保健和社会福利部门、司法制度以及执法机构。自1984年以来，北欧警察和海关麻醉品法律实施合作小组一直在组织各北欧国家重要实施机构之间在麻醉品问题上的合作。1985年，北欧国家部长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北欧国家禁止麻醉品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已经在若干领域实现了集中的合作。

根据警方和海关当局之间进行合作的制度，北欧毒品联络官员已进驻几个毒品生产和过境国家。我们对在北欧国家中缴获的毒品进行了分析以确定毒品的产地和分销路线。在研制技术设备、培训活动以及制定共同行动方针方面也进行了协调。

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北欧国家的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司法部长、公共管理和内务部长们在一起讨论了对付北欧国家毒品局势的今后工作和合作问题，并通过了八点北欧反毒品方案。这一方案已作为会议文件A/S-17/6在特别会议上散发。

就区域合作而言，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和美利坚合众国最近在卡塔赫纳召开的会议。我还愿同其他人一起赞扬那次会议所取得的建设性成果，卡塔赫纳宣言正是这一成果的反映，因为这一宣言对我们的工作有直接的影响。

大会第44/141号决议明确确立了联合国在国际行动中的作用，该决议确定反对滥用毒品、非法生产和贩卖麻醉品作为一种集体责任应该尽可能地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该决议还声明，联合国应该成为反对非法毒品协调行动的主要中心。

挪威政府希望本届特别会议制定一些方案进行努力使其目标得以实现。我愿特别强调以下几点：就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的作用而言，本届特别会议应该重申已赋予联合国系统的职责。本届特别会议还应该采取措施弥合资源差额，这个资源差额使得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和部门无法完成它们的职责。另外，本届会议还应通过其他的授权并给予足够的相应资源来提高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挪威政府希望，行政协调委员会就全系统计划正在从事的工作能在今年3月31日前完成。已经提交给本届特别会议的初步进展报告是一个关键性文件。该文件特别强调必须有充足的资源，以履行现存的各项职责。

除非我们随时准备在尽可能的程度上动员所有各项可能得到的资源，国际反毒品的运动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今天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联合国经常预算只有0.4%用来同毒品作斗争。因此，勿庸置言，现存资源和我们面前的任务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为了确保全球行动方案能够在本届特别会议上通过、得到实施并产生有效的影响，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能够得到必要的资源，以便从事它所承担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毒品贩卖分子有大量的资源，因为他们有庞大的金融系统网络，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和运输，每年非法贩卖毒品所涉及的估计高达5,000亿美元。因此，为使联合国能够履行其职责并完成其任务，必须有充足的经常预算拨款。



另一方面，制定全球行动方案还应考虑经济方面的现实因素，以确保其结果是一个实际和公正的优先项目议程。在这一方面，我想表明，我国政府认为必须适当考虑生产国在打击非法生产和贩卖毒品的斗争中的一些经济因素和需要。我们认为，一项具体并着重于行动的全球方案将增加获得额外资金的机会。

我们还必须确保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目前有必要改革联合国毒品机构。现在，有三个完全致力于同毒品作斗争的联合国机构。一个是麻醉品司，另一个是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及其秘书处，第三个是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禁毒基金）。我国政府认为，目前安排已不能够充分地满足联合国采取更加协调一致和条理分明的行动的需要。当然，我们认识到，改组并不能够代替这一领域的有效的国际措施。我们希望，大会授权调查结构问题的专家小组探讨是否可能成立单一联合的联合国毒品机构。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就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说几句话。挪威从一开始就一贯支持禁毒基金并且被列为主要的捐款人，对此感到自豪。在今后几年中我们仍愿保持这一立场。该基金在制定毒品领域的主要援助方案方面起着领导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农村发展方案。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经常难于提供经济可行的替代作物。尽管如此，减少产地供应的最好方法是向农民提供其他替代性收入，同时建立恰当的社会基础结构并改善行使司法体制。我们相信，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基金将最完美地完成这一工作。

我还想赞扬禁毒基金，因为禁毒基金对制定全球性行动方案给予了非常宝贵的投入。我希望，本届特别会议认真审议禁毒基金为全面解决毒品产量最高地区的毒品现象所提出的次区域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消除非法种植毒品只是把从一国赶到另一国的情况。

今天，滥用毒品已不仅仅是一个健康和社会问题；而是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对公共和经济秩序以及对民主政治体制的威胁。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战斗上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让我们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时，不要忘记已经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联合国内的进展。

我们都应认识到，我们共同的和单独的缉毒努力如果不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将被毒品合法化的幽灵所缠绕。我毫不怀疑，那样做将会给会员国和它们的人民带来极端消极的后果，定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

最后，我再次表示希望，本届特别会议能重新推动反对麻醉药品威胁的斗争，制定具体的和着眼于行动的全球计划，这一计划将吸引必要的额外资源。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阿瑟·罗宾逊阁下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发言。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阿瑟·罗宾逊先生在陪同下走上主席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地欢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尊敬的阿瑟·罗宾逊阁下，并请他在大会发言。

罗宾逊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我十分感谢有机会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上讲话。当今最紧迫需要的莫过于本届会议所涉及的这项工作了：即扩大国际间在反麻醉品威胁所有方面的斗争中进行国际合作的规模，并增加其有效性。

主席先生，我最衷心地祝贺你当选本届特别会议的主席。我相信，你的外交经验以及你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刻理解将大大帮助我们在制定一项全球性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生产和滥用以及贩运的行动纲领方面找到一致意见。

我也谨再次真诚地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在制定联合国全系统范围控制麻醉品滥用行动计划方面，他将再一次被要求担负这一领导责任。

现在迫切需要全世界各社区充分理解非法麻醉品的各种危险。重要的是，要使他们认识到势力庞大的国际麻醉品集团不仅对个人和家庭而且对国家机构甚至各国本身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对于小国而言，这一危险尤其现实。非法的武器转让、国内严重麻醉品的消费增加以及犯罪率的提高都对内部安全造成新的可怕的灾难。

确实，以前仅仅是原产地的那些国家，现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消费的状况，而麻醉品消费大国则已成为麻醉品的生产国。

这个问题在继续升级，而且据我们所知，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社会、经济和年龄类别的麻醉品嗜好者人数达几百万。此外，年复一年，各种新的促使人们上瘾的药物不断在市场上出现，其使用的形式和方法往往要比以往更具效力和更危险。

各国几乎一夜之间就承担了这样一些人的负担：这些人已经变成类似潜伏在黑暗中的掠夺成性的动物，他们通过无情地攻击人们来满足自己对物资上的贪婪（满足自己对麻醉品的无法控制的嗜好）。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与社会的根本结构受到摧毁，而且当今的各国政府承担着巨大的道义、社会和经济负担。

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所涉及到的范围要求采取更为果断和有效的办法。我们不能再将自己限制于传统的方法上。现在，我们有紧迫的责任找到并采用果敢而仔细经过研究的战略。寻求制定这些战略的努力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我们以前所持有的观念和态度，并尽早提出积极的结果。

在过去一年，我们了解到哥伦比亚的兄弟们所遭受的创伤和不幸。在那里，合法政府的权威受到麻醉品集团势力及其暴行的挑战。这些集团所表现出的凶残本性清楚地说明麻醉品集团势力为一己私利而愿意走多远。

相比之下，哥伦比亚人民所表现出的令人钦佩的勇气和力量以及哥伦比亚政府要与这些集团进行战斗的决心生动地显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何种努力和牺牲，以禁止并最终消除人类的这一迫害。

我们许多国家都已感觉到可卡因流行的恐怖所造成的全面影响。迄今为止，相对来说并未受到损失的那些国家不能沾沾自喜，或因为狭隘的本国利益而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作法，误以为麻醉品的灾害将不会触及他们。最近这种麻醉品灾害的性质已不容任何国家感到安全以及感到会免受伤害。

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以前已经取得协调的行动。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主持下已经缔结了不下于12项多边控制麻醉品条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其中有些条约的缔约国，尤其是1961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及修改该《公约》的

1972年《议定书》。最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签署了《1988年反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是迄今为止在麻醉品问题上进行最高层次国际合作的产物。容许我最强烈地呼吁各会员国采取所有必要的立法及其它措施，从速使《公约》早日生效。在其生效之前，我也敦促各会员国根据《公约》，采取临时性措施，把清洗自麻醉品所得金钱的做法判作有罪；促进麻醉品犯罪证据的交换；追踪、冻结和没收非法贩运而得到的收入；并利用控管运毒品的技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目前正在制定立法，加强以前为抑制并控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生产的各项法规。这一项立法也将考虑到1988年《公约》，以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麻醉品执法机构增添一个法律工具渗透银行的保密制度，进行有关麻醉品问题的调查工作；确定、追踪和冻结或没收麻醉品贩运所得；引渡犯罪嫌疑分子；并向这一《公约》的其它各缔约国提供相互间司法和法律方面的援助。

在过去的十年内，我国的麻醉药品使用和消费量增加的幅度很大。看来我们中间没有人能够预言这种现象。但是，从那时起，我们就更深入地理解影响到非法麻醉药品贸易过程的根本因素。我们认识到，随着北加勒比地区辑查战略变得更加有效，在南加勒比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路线，使大量可卡因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过境。我们很快就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麻醉药品过境点。

随着我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过境点，我们也出现了消费麻醉药品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我国人口中根深蒂固，尽管我国执法机构进行了强有力的攻势，没收了大量可卡因。我们已经从1970年1月没有接收一个吸食可卡因上瘾者，发展到在过去两年平均每年接收1000多人的境地。在一个只有100多万人口的国家，这个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令人不安，正如各会员国想象的，这个问题对我国有限的人力和资本资源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但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决心在我们有限的资源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解决这个国际性的贩运麻醉药品和滥用麻醉药品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重点一直放在治疗上，我国现在有一套完备的治疗康复制度，重点还放在执法立法上，以及进行国际合作上，我们将继续加强所有这些方面的工作。

我国除了改写我国立法以支持《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国际公约》和扩大我国治疗和康复资源外，我们还编制了一项总计划，其中制订了执行该计划中所要进行的全面方案行动以及执行的战略。该计划包括：培训警察、军队、海岸警卫队和海关，掌握管制供应的方法；提供更多的设备以对付麻醉药品贸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强警戒我国的海岸线；在我国的各开放口岸辑查麻醉药品；以及捣毁大麻种植园。

我们把麻醉品教育编入学校的教学大纲，并加强了在滥用麻醉药品方面培训学校老师的工作。我们制订了一个重要的降低需求的项目，其重点是，成立一个公共信息中心、开展公众教育运动以及社区促进保健活动。我们和委内瑞拉缔结了双边协定，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加拿大、法国和我们兄弟的加勒比共同体的各国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合作安排。在这里，我必须对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向我国提供的财政支助表示深切的谢意，基金的赠款极大地援助了我国所进行的努力。

我认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的审议工作应着重审议我们在这种现象的不可预见性、难以控制和难以捉摸的特点方面的教训。

首先，预见我们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麻醉药品问题的性质是十分困难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内，麻醉药品问题在药理学、使用和制作方法以及分销方式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许，对目前这场瘟疫的破坏性特点作出最重大贡献的是吸毒上瘾者所提出和使用的可卡因的新形式。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共所周知的快克。人们不知道在今后十年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吸毒上瘾的问题不会迅速解决，以及问题的新形式将会出现。我们已经看到把可卡因制品与其他麻醉药品，例如海洛因合成的倾向，我们还看到从毫无良心的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出现了所谓特别合成的药物。

第二,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合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战胜这个问题。不幸的是,非法麻醉药品贸易是一项最有利可图的国际商业活动。据联合国麻醉药品司提供的情况,非法麻醉药品贸易的价值每年都在25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之间。其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在他们所认为是自己的业务领域里,绝对不受限制。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市场,无辜百姓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如果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我们的管制和预防战略特别有效的話,他们干脆转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

任何人都不能躲避这种卑鄙的犯罪活动。他们的活动方式连成一片,很少考虑到国界和约束我们的国际程序。在对这些残忍的罪犯绳之以法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越来越绝对必要采取办法以确保对被指控犯有罪行的铁腕人物绳之以法,并充分发挥法律的效率,或者将其免罪,或者将其惩办。

正如我以前所强调的,请允许我再次强调进行新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对于解决在惩办非法跨越国界进行麻醉药品贩运的罪行中出现的问题在现在,具有重要而紧迫的必要性。现在不仅应该把通过可接受的调查和司法程序来审判跨国罪犯的问题放在国内议事日程上,也应放在区域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关于国际刑事法庭拥有对某种罪行的司法权的建议,现在应立即得到国际社会的考虑。

在过去,国际形势也许并不利于采取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措施,我必须再次质询,对于犯毒者日益加紧剥夺我们人民的人性的行为,我们是否能忽视或作出微弱和不足的反应,这些贩毒者就象蛆一样,在腐朽和死亡上养肥了自己。

我要问:国际社会是否能继续让这种掠夺人们精神和肉体的人泰然而傲慢地走到我们中间来。回答必须是:不能。回答还必须是在协商一致的安排和适当地考虑到各国主权和尊严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国际法庭;由自由选出的国际知名法官组成的法庭,他们将使国际法准则规范化,并充满活力,他们反映了对全球危机的全球安排的必然规则。

局势的严重性要求国际社会作出同样的反映。令人高兴的是，关于究竟是生产国还是消费国导致产生滥用麻醉品的困境并应付主要责任的争议已有了很大的减少。随着供应国和消费国之间区别的迅速消失，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从各条战线上同时采取全面的进攻行动。这一认识的结果是，受影响的国家开始进行紧张的对话和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必要的武器来打击和摧毁麻醉品交易。各国间的一致努力必将为麻醉品大王带来问题，因为这将使他们几乎没有隐藏的办法，并使他们几乎没有进一步建立全球网的机会。

现在显然应该是我们阐明真正问题的时候，并且应该不遗余力地发展能够得到迅速有效执行的实际战略。1987年6月举行的国际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会议标志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的国际意愿的出现。现在推动所有领域中的斗争是我们的庄严责任。

现有的联合国机构应当得到必要的支持，使他能够促进并协助执行国际麻醉品公约，尤其是新的公约，因为这一公约更精确的处理了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会员国应当得到必要的援助，以便执行1987年会议产生的题目为“控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的优秀文件。

这一文件在讨论问题的各个方面时，汇集了国家、区域和全球防范性方式所必需的各种要素。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执行我们已一致同意的那些措施上，而与此同时，还要接受能够扶助并加强我们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的建议。

各国政府必须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有效的解决国际麻醉品交易的各个方面，并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早日根除国际麻醉品交易。

让我们大胆地宣布我们的目标是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没有麻醉品的世纪。让我们把下列这些人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出去：贩运麻醉品的人、那些造成青年人死亡和毁灭的人以及那些通过利用从世界各地几百万孤弱无助者的痛苦中得来的巨额资金促进他们自己利益的人。

让我们把1990年代——即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成为致力于对依赖麻醉品进行斗争并从人类中根除这一祸害的十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非常热烈地感谢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刚才所作的重要发言。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理阿瑟·鲁宾逊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吉列莫·拉尔科·科克斯参议员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大会将听取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发言。

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吉列莫·拉尔科·科克斯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吉列莫·拉尔科·科克斯参议员阁下，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拉尔科·科克斯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毒品贩运由于其性质和范围，影响着全人类并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早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上，秘鲁就阐述了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为消除这一祸害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但正如其他超越时代的预言一样，我们的话被认为是危言耸听，谁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得到优先考虑的问题，也不认为需要立即对他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

四十五年之后，联合国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是由于现代社会的这一祸害所达到的严重程度所迫。取得共同立场，并集中力量使国际合作符合问题的新要求这一目标使我们感到激动。秘鲁政府要赞扬这一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以最这一问题的全面理解为基础并能够通过合理的合作措施实现的全球行动纲领，结果将是有限的和无效的。现在存在着许多危险，因为贩运麻醉品现象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



司法和政治方面。过分简单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并没有阻止问题的突然增加。根据统计数字的估计，可卡因的生产、贩运、商业化以及滥用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这使我们感到极不愉快，因为在我们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牺牲了许多生命，动用了许多资源，但这些现在看来似乎都是徒劳的。

但在表达挫折感的同时，我们要重申与麻醉品贩运进行斗争，直到其彻底根除的决心。我们知道我们的斗争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代价高昂的进程，我们也知道秘鲁是我们所致力于的反对可卡因的斗争中的三个前线国家之一。我们秘鲁人现在作出的牺牲与我们的能力是不相称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一种紧迫的道德感正在推动我们，他使我们乐观的认识到我们可以依靠联合国及其所有会员国的有效支持与合作。

在这一世界会议上正出现着一种历史责任。我们必须向麻醉品贩运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我们将团结战斗，消除麻醉品贩运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我们将消除需求，执行作物替代方案，为我们的青年人带来一个更公平的世界，这个世界将具有建立在人类潜力基础之上的价值，将具有基本自由的明确概念，并从而反对那些经常要求人们采取超越人能力范围的被驱的行为模式的原始模型。

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以不带任何偏见为开端，并且以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所需的那种客观态度来对待他。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识到麻醉品及其非法贩运问题是与人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有关的，他的根源产生于成为我们大多数社会特征的贫困。

贸易条件对我们原材料的生产越来越不利的这种国际秩序以及对发展不足产生影响的同处理我们巨额外债联系在一起的调整政策，迫使我们那些面对贫困和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间接地提供个人和社会所需求的刺激因素，而且虚假的价值导致了歪曲社会行为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造成问题的因素上，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方面的因素。

鉴于这种现实，至今所采取的态度是以简单的分析为基础的，这就导致了基本上是压抑性的反应，忽视了能够解释毒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等问题的那些社会经济条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惩罚性的，目的是制止不断增加的犯罪活动。在实行较为严厉的惩罚措施和严厉的警察程序的几年之后，我们似乎转了一圈又绕回来了。

然而，现在已经出现了变化。今天人们承认共同责任的明确的原则。虽然不能逃避我们作为生产者所担负的责任，但是产品是生产来满足需求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原则。同样，在非法毒品贩运中，还涉及了其他因素：一方面是原始化学物质，另一方面是对允许在受到滥用毒品影响的国家对非法盈利进行洗钱的金融系统的要求。所有这些扩大了责任的范围。

一向由于不平衡的需求而促成的毒品贩运使我们当中那些陷入发展不足的国家不可能把我们自己同那些创造并维持需求的国家相比，也不可能使之成为财富积累的一种机制，因为这些国家只得到毒品贩运利润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要求根据我们发展不足的程度给予大量的援助。

指出了这些基本的事实之后，我们也要重申我们坚信，反对毒品贩运的全球性斗争必须在国际法原则的构架中进行，特别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它们的内政。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反对毒品贩运的斗争将会被歪曲，其道德原则被削弱，其目标遭受破坏，而且这场斗争终将被转变成为一种权力和干涉的工具，在一个努力争取更好理解与合作的世界上，那样做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正如第44/142号决议所确定的那样，反对毒品的全球斗争是以国际社会共同责任的原则为基础的。因此，现在必须从本质上考虑毒品贩运问题，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个市场高度垄断的现象，根据秘书长的年度报告，其市场的货币价值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价值，而仅次于通过非法军火交易得到的收益。因此，我们必须现实地并且根据我们的目标考虑每一种选择或一系列的选择，以确保战胜毒品贩运，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而并非仅仅是其次要的方面。

由于毒品贩运者的盈利和利润是巨大的，从理论上禁止毒品大王设想消除种植毒品或这个问题的普遍军事化只能导致毒品管理集团的迅速迁移，转移和扩大目前的非法种植地区，并重新估价解决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因素。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可能从消除种植毒品中找到，就好象它已经接受了下列事实一样：需求的增加使这个问题恶化。只有在实现了针对种植替代的其它经济发展之后，才能够找到古柯生产问题的办法。为此，正象安第斯国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必须进一步研究多边建议，以争取必要的合作来解决它们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国际协调与合作必须是争取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政策的基础。这就要求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修改贸易条件和重新安排外债，因为如果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可能实现所期待的目标。我们必须通过象其它区域那样的一种制度，获得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并且使传统和替代的产品得到适当的价格。

秘鲁目前的情况意味着粮食生产已经被古柯种植所取代，这进一步歪曲了国内的经济进程。同时还有一个反向种植替代的进程：1988年除掉了680公顷的古柯叶生产，但是就在同一年古柯叶的非法生产增加了5000多公顷。

因此，我们强调战胜毒品贩运的政治意愿必须体现在通过国际文件，以消除贸易限制，并保证优惠待遇，这是使替代发展方案行之有效的唯一方式。我们将把不愿意或不能达成这种文件看作是缺乏采取一致行动的真正政治意愿。

全世界用来非法生产可卡因的古柯叶生产的65%被归咎于秘鲁。因此，有人要求秘鲁采取大量措施对非法种植进行定罪和惩罚，把它从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脱离开来，并且忽视完全压制地处理生产者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如果采取这种措施，将爆发全面的恐怖主义活动，必须在这个范围内看待问题，因此，很显然，这种措施将导致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两者之间加强罪恶的勾结。

然而，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同时也由于激励自己的道德原则，秘鲁几乎是单独地进行了一场反对毒品贩运的难以取胜的斗争。但是我们再也不能相信，受到非法生产影响的国家能够奇迹般地单独地赢得一场属于我们大家的责任的斗争。

在另一方面，有人试图证实，古柯叶的生产使农民富裕起来，并且促进了秘鲁经济的活力，因此有人宣称这是外汇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必须强调指出，从可卡因贩运而积累的最大的价值在于不在秘鲁进行的加工和销售阶段。在我国，是种植了古柯叶，但是并不生产可卡因。古柯叶自古以来就种植，但不是用来生产可卡因。它本来的使用目的不能同现在威胁我们年青人的那种非法产品联系在一起。现在进入我们经济中的非法收入的部分是微不足道的，不管怎么说，如果同秘鲁用来打击这一祸害的资源相比较，那绝对是微乎其微的。

我刚刚参加了在最高政治一级举行的卡塔赫纳首脑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受到本地区这一问题最直接影响的海球各国。因此，我们开始了主要以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这一努力在漫长、复杂和代价高的进程中具有十分明确的目标。我感到乐观的是，我们将在成功地对付这一问题方面得到所有国家的参与和承诺。

卡塔赫纳首脑会议是一种新的谅解形式。对我们各国来说，它意味着把一种经常被强国的傲慢要求所支配的关系所产生的历史的恐惧置于一旁。它意味着用全面的多边途径取代部分的协议，这一全面的多边途径将作为有效双边协议的构架。其目标是为了在反对毒品贩运斗争中提出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概念。

我们认为，卡塔赫纳首脑会议的结果应有助于在联合国范围内促进各种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致力于这项任务的各方的倡议可得到沟通。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我们的努力获得成功，毒品贩子就会企图在迄今为止不太重要的其他市场找到替代对象。我指的不仅仅是近几十年来已经取得高度繁荣和进展的地区和国家，而且还指的是那些由于本国的政治变化其人民现在面临新的风险和价值观的国家。秘鲁政府和人民重申对于毒品灾祸作斗争的坚定承诺。这场斗争不能只是受到非法生产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负担。它要求执行我已经提及的一整套措施和开展适当的无条件的国际合作。我们各国社会的未来正冒着一种不必要的风险，一种不道德的风险。各国政府在道德上有义务肩负起积极参加这场斗争的责任。我们必须放弃追求消极的、过分简单化的偏面的方法。

我们必须制定更高的行动目标，作长远的打算，而不是仅仅满足国内公众舆论的要求。让我们回顾对政治家提出的英明的忠告：“把你们的眼光放在下一代身上，而不是放在下一次选举上。”这样，我们将能够对付这种罪恶的现象，这种现象今天正在破坏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并使让后代道德复兴的希望落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吉尔列莫·拉尔克·科科斯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顾英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您当选为本届会议主席表示祝贺，并预祝会议成功。本届特别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召开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反对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政治意志和坚强决心，必将对今后世界禁毒斗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尽管国际社会采取了反击措施，世界范围内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局势继续在恶化。吸毒现象在不少国家迅速蔓延。与麻醉品有关的死亡、违法行为大幅度增加、一些国际贩毒集团继续肆无忌惮地从事其非法贩运活动。总之，毒品危害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世界各国都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禁毒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是极其必要的和迫切的。因此，本届会议就此发表政治宣言和制定禁毒全球行动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十分及时的。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国际毒品问题的严重形势，积极主张开展国际禁毒合作，并为国际禁毒合作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认为，在开展禁毒国际合作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该严格遵守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相平等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任何国家不得在另一国的领土内行使其管辖权和职能，不得以缉毒或国际禁毒合作为借口，对别国进行武力威胁，甚至武装入侵。双边、多边合作项目的执行以及禁毒联合行动也都必须在不违反、不违

背各有关国家宪法和法律及国内立法制度的基本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然而，最近在国际社会谋求加强国际禁毒合作的同时，国际上却发生了一些与上述原则相违背的事件。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谴责，而且对于开展国际禁毒合作也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要在全球范围内扫除毒品危害，必须有国家、地区和国际三级的共同努力，其国家级的努力是基础。而国家一级的扫毒工作，各国都有一些好的经验，应该很好地进行交流，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中国代表团认为国家一级的禁毒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公安、海关、卫生部门以及各学术研究机构应该相互配合，积极合作。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我们认为与毒品危害作斗争是消费国、生产国和过境国的共同责任。它们应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积极采取对策。消费国在减少麻醉品需求方面负有主要责任，不仅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麻醉品需求量，并切实地实施吸毒成瘾者的治疗和康复方案，而且还应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由于毒品问题所带来的困难；生产国应积极开展粮食替代计划，坚持执行旨在逐步减少并最终消灭非法种植的方案；过境国应加强边境缉毒，并与有关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打击非法贩运，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扫除边境吸毒，防止蔓延。在此基础上，各国应积极开展禁毒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联合国各麻醉品管制机构及有关国际组织在该领域的作用，也应该得到加强。

在历史上，毒品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的同时，把中国作为其倾销鸦片的市場。鸦片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从此开始了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历史。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毒品是深恶痛绝的。鉴于毒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危害，1909年国际第一次禁毒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是很自然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我中央人民政府早在1950年2月24日就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严禁吸食、贩卖、种植和私存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各种毒品，违者严处。我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是一贯的、坚定不移的。因此在建国后30多年里，中国曾以无毒国家称誉世界。近几年来，国际贩毒集团与我国境内的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以我国某些边境省市作为过境贩毒渠道，把毒品转运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案例不断发生。为此，我国公安、海关部门已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缉毒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9年侦破毒品案件547起，缴获鸦片269公斤，海洛因488公斤。针对我国边境地区吸毒者人数不断增加并有往内地蔓延的趋势，我国卫生部门积极采取治疗和预防措施，已在北京和云南省建立了治疗康复中心，为今后加强戒毒治疗，预防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基础。尽管如此，我国在缉毒、治疗、预防和科研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我们愿意在这些方面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交流经验，相互学习。

禁止滥用麻醉药品和打击非法贩运毒品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国际社会作出持久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1987年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会议通过的《宣言》和《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以及1988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为国际禁毒运动提供了全面而详尽的建议和要求。这些建议和要求如能得到有效实施，将为国际禁毒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了上述两次会议。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新公约的制订工作，我国是最早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之一。1989年9月4日，我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批准了这个公约。我们希望尚未加入或批准该公约的国家能尽快加入并批准，以便使该公约早日生效。

在国际禁毒斗争中，我们不仅与有关国家密切配合开展双边合作，而且与联合国禁毒基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联合国麻醉药品司以及国际刑警组织，海关合作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面临的过境贩运问题将随着国际贩毒集团加紧向我渗透有可能不断增加，因此，我国在缉毒、戒毒方面的任务是长期而又艰巨的。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坚持改革开放和严厉禁毒的明确政策，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国内缉毒戒毒，加强与联合国麻醉品管制机构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并积极与其他友好国家开展双边合作，为在全球消灭毒品灾害作出不懈的努力。

毒品犯罪的国际化以及对人类社会危害日趋严重的现实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尽管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各国反对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政治意志和坚强决心是一致的。我们相信，只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迅速作出更加有力、更加全面、更为有效的行动，我们一定能取得与毒品恶魔斗争的最后胜利，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科姆普列科托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苏联欢迎并坚决支持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的召开，这届会议的宗旨是提高并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同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毒品滥用进行斗争。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一论坛级别之高，代表性之广，反映了人们极为关注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这一实实在在的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成员越来越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是必须团结一致，同毒品这一罪恶和病态展开持久的无情斗争。我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来，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所存在的巨大危险，同时也由于我们抱有极大的希望，所有这些情感应当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在缉毒斗争方面，国际合作有了最为积极的发展，几乎每一年都是一个里程碑。1987年维也纳会议和1988会议通过了极为重要的新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仅仅提及这一点就已足够了。我们还应指出，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在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辩论过程中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十分严肃的态度，那届会议还作出决定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显然，我们不能以自满自足这一点来责备我们自己。



但是，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已经出现了能够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那么其回答将不会是很令人宽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问题甚至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尖锐，并且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毒品滥用和与毒品有关的各种非法活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蔓延。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迄今为止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均告失败，或者意味着我们的总政策是错误的？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整个毒品问题以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当然，毒品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范围甚广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换言之，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并且是防御性的，而重点往往是针对各种症状而不是针对疾病本身。

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应当采取有系统的全面办法，对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同时予以治理，这些方面包括社会经济、医疗生物、法律、科学技术等等，同时要对付这一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以及进行治疗和社会康复等等。

现在是时候了，应当将国家和国际各级所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和成就汇集在一起，把国际上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作出的各种努力汇集在一起，制订出一个总的战略，并确保这一战略能够得到有目标的、一贯的执行。

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什么神奇而又简单的解决办法，同时，任何解决办法也不能单靠各国自行努力而得到实现。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制订我们目标的各个方面，这样我们就能极大地增强控制这一疾病的能力，同时也能增加我们的信心，坚信这一疾病终究会得到治愈。

本届特别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一机会，特别是目前局势变得更为有利。正如本届会议已经指出的那样，国际气候正向好的方面变化。人们越来越懂得必须遵循国际法。在解决各种全球问题方面，对抗的方法已经为非对抗的方法取而代之，反映了对全体人类价值的高度关切。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强了我們寻求新的解决办法的能力，这些新的办法将给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已经采取了的各项措施注入新的活力，也会带来积极的变化，使我們有能力同蔓延于全世界的非法毒品所带来的各种疾病进行斗争，并能够征服这些疾病。

我們认为，本届特别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在我們共同意愿的基础上提供政治动力，以使联合国能够集中力量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并执行各项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各项方案。我们的目标是执行一项综合行动纲领，以期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目前，毒品问题在全世界都变得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本组织的总任务应该是制订广泛政策，制订各项目标，同时也应该采取具体的步骤，以加强国际管制毒品体系。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应当开拓一个新的方向，而我們以前的方法则应相对地予以调整。

至关重要的是应当同非法需求进行斗争，因为正是由于存在这种需求，才产生了高达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毒品交易。这一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使得一些国家已经正式建议就这一问题起草一项新的公约。

本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应当反映出一整套措施，其目标在于既要同毒品的非法供应进行斗争，也要同毒品的非法需求进行斗争，这两方面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双重目标的任务中相辅相成的因素。我们可以以生态问题为例，尽管显然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方面。环境问题对于所有生产国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同时对于那些气候条件适应野生麻醉植物在大片领土上自然生长的国家来说也是十分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是要以其他有用的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来取代那些麻醉品植物。

尤其应该重视旨在消除能促进滥用麻醉品的条件的社会活动和措施。在减少麻醉品需求方面的一个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更有效地寻找吸毒者，并向他们提供适当的治疗，最为重要的是，要使得他们能够在社会上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也许归根结底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是要将各国的最优秀科学家聚集到

一起，让他们进行一项彻底的研究，以便寻找到使一个人吸毒的社会、心理和其他根深蒂固的原因。

如果系统地分析联合国框架之内的所有国际法律文件和全面的措施，则能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旨在以各种形式控制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消除非法贩运以及寻找和治疗吸毒者。当然，这是重要的。然而，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特别重视与保证人格全面协调发展有关的措施的问题的时候了。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最具有意义的是个人将身体健康作为社会宝贵财富的精神。应该将重点放在人类及其心理和行为之上。

昨天，秘书长在午餐所作的简短的欢迎词中，说了非常恰当的一句话，即“为了人类的健康”。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本届特别会议的座右铭。

关于国际合作不同阶段的国际文件的工作迄今为止事实上是集中在解决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问题。在国际社会发现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方面出现一个严重问题之后，人们便开始制定这种文件，然而，今天，现在该是朝着一个新的更高水平发展的时候了。极为重要的是，不应只是顺应潮流，而应该要预测它们，以便防止出现不受欢迎和危险的趋势。这种解决办法的前提是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中进行预防性的活动，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和非常复杂的科学发展的任务，以便预测一些能确定这个全面问题发展动力的事件和趋势的办法。无疑，这就要求认真进行努力，并且利用国际社会的所有能力。为了预测和预防，我们需要有动力以及采取各种不同的国际措施，并及时地加以实施。

鉴于目前形势的必要性，为了要预测它们的发展，我们认为，现在可以制定一个较长期的任务，以便产生一个在该领域的全面和集中的协议。这种集中的协议能够使得对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控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它将包括现有公约中的各种规定，以及新的规定。它也将包括打击滥用麻醉品、减少需求和消除非法贩运的合作的各个部分，它也将确立一个统一的制度，以及对麻醉药品、精神物质和用于生产非法麻醉品的具体化学物质进行国际控制的机制，这是极为重要的和现实的。

至于预测和预防的任务，我们愿强调，我们绝不认为这个任务与全面实施和利用现有协议和机制有矛盾，相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可分割和相互关联的过程。

正如许多代表在此指出，各国在各自国家中采取足够措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种感觉。根据现有的情况，成千上万的人目前正在我国使用麻醉品，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我们尤其对于最近几年滥用麻醉品的现象迅速增长的问题感到关切。

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国营的麻醉品作物种植的数字已经减少并且加以集中化。而且已作出决定停止种植罂粟。早在七十年代，我们已经完全停止了鸦片的合法生产，目前正在全面地行动，寻找和消除非法种植罂粟和大麻，以及野生的这些作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措施已经使形势有所好转。然而，也出现了许多困难。消除广大地区野生的大麻的做法侵蚀了土壤结构，并且产生了其他严重的生态后果。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便寻找到各种生态上安全的办法，以便消除麻醉品植物，但是，显然，如果这些工作需要迅速加以进行，并取得成功，所有有关国家的科学努力必须加以协调和结合。

我国已采取严格措施，禁止麻醉品的贩运。对非法种植鸦片和其他种类的大麻、并非法运送麻醉品的公民采取严厉的刑事制裁。同时，对吸毒者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198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令，对那些向法律实施机构自首并且交出麻醉品的人采取更为广泛的行政措施，而非进行刑事制裁。

苏联是在保健系统中的一个专门的精神病机构中对吸毒者进行治疗和帮助，该机构有几百个专门的精神病防治和康复中心及医院，提供全面的保健和社会护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无法对治疗措施的成功率感到满意。就我们所知，其他国家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在这点上，似乎进行联合的研究并制定健全的国际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苏联已经开始采取步骤批准《1988年联合国公约》，同时，正在进行筹备工作，以便对现有的苏联有关立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并建立有关行政机构，

以保证对此加以严格的实施。我们愿意在该《公约》正式生效之前，尽可能全面地实施其规定，我们也已经开始与一些国家在《公约》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合作。

我们相聚在此，共同寻求各种办法和途径以便提高现有国际机构的有效性，并且考虑是否有可能寻找到各种动员国际社会进行具体努力以便消除当代社会罪恶的方法和方式，我们坚信，这种合作以及所采取的任何步骤必须严格和认真地遵守国际法的规范和原则，而不应在各国间产生冲突，更不应该使各区域的军事和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

我们支持有关加强和提高现有联合国机构和秘书处部门的效力的建议，并且极为重视这些方案。我们赞成制定有效的具体文件，并准备研究新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想法。我们尤其赞成关于禁止滥用麻醉品联合国十年的建议，以便作为实施全球行动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建议将下列具体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列入本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即全球行动方案：制订限制非法麻醉药品跨境运输的多边系统并在有关各方平等的基础上在非法国际毒品贩运的主要地点建立海关检查站，同时适当考虑产地国、过境国和消费国的利益；制订国际方案以开发有效的缉查非法的毒品庄园并以生态安全的方式加以销毁的有效技术；制定吸毒者的治疗和社会康复国际方案；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咨询中心，以汇集并消化在同非法贩运毒品和滥用毒品的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评估并综合在这一领域的国家科学方案和研究，并协调各国建立这种方案的努力；沿照联合国刑法情报网，建立综合的联合国有关非法毒品贩运和滥用毒品问题的情报网和数据库；定期出版各国负责处理根除非法贩卖毒品、预防滥用毒品并给以吸毒者治疗等各方面问题的中央国家机构的最新清单，标明国外通讯路线、职责、职权范围等。

苏联代表团将尽全力为本届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我们随时准备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合作并作出共同的努力，有效地同滥用毒品这一全球性疾病进行斗争。又通过共同的关心、共同的责任感和共同的希望而联合起来，我们才能确保成功。

加西亚·巴尔加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愿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祝贺,1987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会议扩大了联合国处理毒品问题的方法并使之面向未来,自从那次会议以来,秘书长表现出勇敢无畏和充满活力。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联合国不仅有助于解决各国之间的双边冲突,并且还有助于解决主要的全球问题。

本届特别会议已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使我们得以通过协调行动加强同堕落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毒品问题进行斗争,并且深入调查其根源和后果。

近几十年来使用毒品的进程不断地加快。过去在许多国家中传统地、魔术般地和有时虚假的治疗用途已经有所改变,现在的局面是,令年青的一代人大规模地滥用合成产品,并且使用极高的病理治疗形式,这些产品的药力以前鲜为人知,并且具有极大的致瘾效力。毒品的传统使用方法同现在在我们社会中传统使用的方法无法相比。这样,我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可以而且必须参与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本届特别会议就是这一原则的充分体现。这一严重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几个生产、加工或者消费毒品的国家。今天,所有的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卷入了这个问题,这一问题只有在共同国际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解决。

共同负起责任这个综合性的方法已经取代了不久前仍广泛使用的并导致生产国和消费国互相指责的传统分析方法。本届特别会议将制定一种新的国际理论,并且把国家分为受害者和罪犯的理论,并且鼓励在各个领域进一步合作。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摈弃以前存在的紧张和冲突。例如伟大的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卡多所说,“如果你想建造一所房子,就不必学会互相往头上扔砖头。”

另外,存在着强有力的先例。哥伦比亚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先生及其政府所采取的坚决立场表明,政府可以顶住毒品贩卖分子的威胁并动员全社会保卫价值观念和互存原则的民族体制,这一原则是贩卖毒品所无法比拟的。

反对贩卖毒品的必要行动要求我们有更大的活力,但是这不应该使得我们去使用可能影响国家间良好关系的压迫或控制的体制,因为,这场斗争要想行之有效,国家间的良好关系就必不可少。

1988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维也纳公约》为我们的行动制定了最恰当的构架，1989年6月在联合国总部，我曾很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签署这一公约。除了制定在这一领域的国际性办法外，该公约还是我们得以把制造毒品所必须的化学物质列入国际性检查的体制。另外，并将非法所得运往国外的斗争也成了一个主要目标。

在未来的数月中，批准和实施该公约将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目标。包含没收毒品贩卖分子货物和控制其资金的条款将成为把辑毒的协调政策引入新的方向的重要参照标准。我们必须使国际金融界知道，业务缺乏公开性和隐瞒有关来源可疑的资金事实可能破坏他们的声誉，因为，这种行为可能被看作是对贩运毒品分子的支持。

刚刚开始缔结的国际协定允许对某些有关毒品走私的案例解除银行保密，这些国际协定为反对贩卖麻醉药品的国际金融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另外，欧洲共同体内在这一领域的刑事立法标准化可能会大大促进在最高的层次上作出决定。联合国各会员国都应牢记：必须遵守最近在巴塞尔通过的金融道德守则。

但是，如果在金融领域的这种合作不扩展到税收和庇护地的更通融的金融机构，这种合作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金融机构今天已成了反对非法洗钱斗争的最大障碍。税收的庇护地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资金来源和存款人身份的控制。

在联合国的构架内，西班牙将全力支持通过全球禁毒行动方案。这一方案将包括并影响1987年6月维也纳会议通过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的各项内容，并且还应考虑1988年公约所制定的新的内容。在全球行动方案中，在毒品问题上的南北合作应该被视为进一步表现各国间必要的团结。

在全世界缓和以及国际紧张局势放松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不能就援助麻醉品生产国并与之合作的政策达成协议以便促进其社会与经济发展并使其能够放弃种植某些麻醉品，那么后代的人将不会理解，也无法原谅。这种合作将加强并鼓励这些国家的和平进程以及对基本自由的维护。最近的卡塔赫纳首脑会议以极其充满希望的语气表明了这一点。

联合国控制麻醉品滥用基金正在为支助作物替代政策进行着十分积极的工作。但是，除了这些措施之外，我们也必须考虑是否有可能促进替代产品的出口，鼓励灵活地为外债提供资金并使向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金融机构参加为促进麻醉药品生产和加工的国家实现社会与经济增长而制定各项计划和方案。

另一方面，受严重吸毒成瘾问题影响的那些国家必须执行一条明确的政策，目的在于减少对麻醉品的需求，这一点与减少供应同样重要。我们发达的、开放的西方社会是以高度的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他们极为容易受到麻醉品的威胁。然而，我们必须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鼓励消费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常常难以解决。我们必须审查自身的价值体系，因为这些体系常常宣扬个人成功，并把经济力量和成就吹捧为最终的目标，鼓励竞争而不鼓励团结。

在针对从植物提取麻醉品从事贸易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取得成功；但如果我们不阻止需求并解决其根源，那么不是从任何植物提取的合成麻醉剂将会在今后几年成为无法估量的威胁。

此外，麻醉品并不仅仅是对许多人的身体及精神健康的一个威胁，而且也是一政治上的危险。艾滋病的出现及其对静脉注射麻醉品成瘾者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已经突出说明了这些人的悲剧也增加了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传播的危险。由于艾滋病引起的死亡，与麻醉品滥用有关的死亡人数已大幅度增加。艾滋病在不使用麻醉品的人们中间以及在异性恋者之间的传播迫使我们作出果断和现实的决定。

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对于在我们国家出现吸毒成瘾的现象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感到极为不安。全国的海洛因消费量已经得到稳定，我们也已设法增加了到保健中心就诊的吸毒上瘾的人。人们日益广泛地相信，吸毒上瘾可以得到治疗，而且这个问题有各个解决办法可以解决，尽管他们也许会有困难，而且费用很高。我们有一个麻醉品治疗网络，但仍然不够，此外，提供治疗的专家水平也已得到大大改善。所有这些因素都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吸毒成瘾的人来到保健中心治疗。

然而，吸毒成瘾的人受到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感染范围非常广泛——65%的艾滋病例总人数都是通过静脉注射的麻醉品使用者——这使我们不得不实行一些方案，根据这些方案，海洛因使用者可以得到通过社会安全部门提供的免费一次性



使用注射器以及AZT和其他替代性药品。所有这些都是宣传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政策的一部分,这项政策的对象就是这些特定的群体。

此外尽管海洛因的消费得到稳定,但是可卡因的消费情况并不如此,因为近几年来可卡因的使用量已经增加,尽管警方没收的数量大量增加。卫生部门尚未对这一状况所造成的后果进行评估。

在过去几年,西班牙的所谓特殊合成麻醉品消费量也已经增加,但幅度不大,尽管在有些区域所发现的增加量引起人们不安。但值得鼓舞的是,根据最近的调查,日益增多的多数西班牙青年明确地拒绝任何形式的麻醉品。

关于控制初级化学药品问题,西班牙议会即将批准1988年《公约》。我们已经临时采取了控制性机制,它涉及所有出口到某些生产国这类药物。

总之,我要向大会提出一些建议。首先,应要求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在下一届常会中研究一套更为灵活的分类制度。有时,从市场出现新的特殊合成麻醉品到将它列入强制性控制名单,其间的时间间隔也许要长达几年的时间,因而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法律真空。也许应该制定一个药理体系控制的系统,以防止我刚才描述的状况出现。

我的第二项建议是,应共同地编制有关可卡因使用的不良病理影响的国际资料,而且这种资料应广泛分发,以便反驳某些社会集团所散布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可卡因的使用并无害处。

第三项建议是,应要求主要金融机构的主管当局和银行行政部门更迅速而坚决地采取行动,放松银行保密制度,促进调查与麻醉品贩运所得钱财有关的银行账户和资金。应特别强调依赖于决心与麻醉品贩运进行斗争的国家的国外中心或金融庇护所。

最后,我要提一提改组联合国专门处理麻醉品问题各个机构的可能性,特别是麻醉药品司,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联合国控制麻醉品滥用基金。我并非以职能可能重叠或能力的问题而建议修改目前的结构。目前所存在的这些机构是实现得到通过的各项公约所规定目标的工具。我们应该分析是否这些工具适合于实现这些目标,而不应进行有害于现有行动有效性的行政上争论。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寄希望于本届大会特别会议，相信我们将达成协议，并通过一项反麻醉品的共同政策。本届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因为正象一位伟大的欧洲作家所说的

“人类通过努力而创造的任何东西，即使更只存在一天，也应该在如此健忘的世界中得到欢迎。”

在纽约这里，我们必须作出明确而现实的承诺。如果不能在全球作出决定，那么时间，尤其是尤其是正在失去的时间就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如果世界上消除了麻醉品滥用现象，那么这个世界的公民就更加独立，对自身命运就能更好地支配，也就有了更大的自由。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K·D·KHAN 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祝贺你当选大会这次关于麻醉药品特别会议主席这个重要的职务。

我国代表团乐观地相信在新的十年开始时召开的这次大会特别会议，对于全人类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反对麻醉药品全球战斗中冲锋陷阵的那些组织和机构是一个好的兆头。

1980年代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我们这个区域，也就是东南亚和西南亚地区毒品泛滥的十年。在这个十年中，许多国家为打击毒品加强了执法部门的资源。但是，可靠的证据和国际刑警组织1989年的报告都提出1989年比前一年生产、加工和销售了更多的走私毒品。毒品上瘾的人数正在增加，同时在街头巷尾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也在增加；由于贩运毒品和滥用毒品而造成的人员的生命损失也在增加。

据表明，我们的全球战略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人们不太强调最低需求量。我们认为减少供应和需求量对于屡见成功的罪例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如果硬币的一面被损破了，那么这个硬币就不能用了。

1989年，世界的毒品问题逐渐恶化。但是，在巴基斯坦，新当选的政府在我们总理富有才干的领导下，为制止这一罪恶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我们在毒品

战线进行的战斗正在取得成功，毒品问题逐渐减少。 甚至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报告中承认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该报告指出：

“在东南亚和西南亚地区，巴基斯坦为了制止鸦片的种植，采取了决定性步骤”。

我们不仅把传统上人类无法接近的种植鸦片的地区的鸦片禁产量从203公吨减少到103公吨——减少36.5%——而且，巴基斯坦政府还把种植鸦片的地区从11,590公顷减少到5,850公顷——降低49.5%。 没收的麻醉药品——海洛因、鸦片、大麻——增加了40%，这些都证明我国的执法活动开展的好。

现政府管制毒品的战略要求对贩运、生产和加工展开全线进攻，当然还要降低需求量。 不幸的是，今天，巴基斯坦有二百多万毒品上瘾者，其中，仅海洛因上瘾者就有一百万。 在1987年，我们没有一个海洛因上瘾者，但是，到了1988年由于我国独裁政权十年采取了对毒品和毒品走私犯采取的漠然置之和忽视的政策，我们却成了一百多万海洛因上瘾者。 由于这个邪恶的礼物，我们步履维艰，现在这个巨大的需求量对我国以及我国执法活动造成严重威胁。

我们在国内进行的这项调查表明，平均每一个海洛因上瘾者要消费7克海洛因，因此一百多万吸毒上瘾者在国内市场每年要消费约50公吨。 为了获得50公吨的海洛因，必须有500公吨鸦片；我国生产130公吨鸦片。 其他则是由西部边界流入，或是需要进行严格监测的地区流入的非法鸦片。 这个巨大需求量和毒品的流入使我们的任务加倍困难。 我担心，单靠巴基斯坦的资源不足以有效地对付这一局面。

在最近几年，几乎每次高级别大会和会议都提到过这种或那种毒品问题。毫无疑问，一种或多种表现形式的毒品问题以及超越所有国家的边界线，并以危险的规模发展，威胁到许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以及道德价值。

关于召开大会特别会议来处理毒品问题的一致决定反映了国际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在我们审议整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肩负着这个组织的重大机会的特殊责

任，以便打败毒品魔鬼越伸越长的魔爪。需要采取新的、勇敢的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主动行动，以配合和加强联合国已经做的工作。我们一方面应该面向未来，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我们的过去，应尽可能地努力利用现存的机制。《管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1987年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的宣言》和其他国际文书，如《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1972年议定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以及《1988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所有文书在今天的意义和当初通过这些文书时的意义一样。

在我国，现政府特别奉行《1988年公约》，因为我们认为，第5、6和11条是打击贩运者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现政府在就职的时候，就宣布将在1989年前签署该文件。我们实现了这一诺言并根据这个公约，宣布1989年为打击毒品威胁年。我们甚至在签署文件之前就认真地执行了第6和11条，并立即通过一项法案，修订了没收财产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国际压力，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引渡法、管制滥用毒品法和没收财产法是打击贩运者的最有效武器。

巴基斯坦现政府认为还必须加强在区域一级打击贩运者的斗争。因此，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向麻醉药品宣战，并决心在国内和区域一级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根除毒品这个危险。贝娜齐尔·布托总理在伊斯兰堡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建议，宣布1989年为该区域取缔麻醉药品年。这一建议显示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的《伊斯兰堡宣言》。该《宣言》的一个成果是成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制定一项关于管制毒品的区域公约的重要性。最近召开了一次专家级会议，以制定这个区域公约。巴基斯坦政府除了采取区域性主动行动外，还与负责麻醉药品管制的国际组织进行全面合作，并积极制定在北方传统上种植鸦片的地区种植替代作物的计划。与外国还建立了联络和工作关系，例如，美国毒品执法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卡特尔管理处、加拿大皇家骑警、联合王国海关以及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警方。1989年12月，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在该区域和边界线打击贩运毒品签署了一项新的条约。

此外，法律空隙为麻醉品大王提供了利用他们的金钱和影响买来宣判无罪的机会，为了堵塞这种法律空隙，现在正在对反对麻醉药品的现有法律进行彻底研究，以便给予违反者威慢惩罚。 两项法律草案——规定了防范性拘留和扣押从麻醉品收入中获得的财产的法律——已由巴基斯坦政府首先提出，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我国政府已组织了一支财政特别工作组，正如《1988年公约》所设想的那样。 这个工作组被称为反麻醉品精华力量。 它的主要工作是调查贩运者的财产以及他们的银行帐户。

由于充分意识到吸毒上瘾者的痛苦和困境，巴基斯坦政府已开始进行麻醉品上瘾者的治疗和康复工作。 提高认识运动已通过新闻界展开，目的是为了群众了解并敏锐地意识到需要提高社会意识并采取行动。 非政府组织、私人医生、社会和宗教工作者、社区老年人和其他人正通过家庭干涉和社区行动计划积极参与防止滥用麻醉品措施。

巴基斯坦政府高度赞赏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在毗连阿富汗的西北部边界省罂粟生产地区执行我们的发展项目中提供的宝贵援助。这些项目的目的是为了以种植经济作物，例如蔬菜和水果，来取代罂粟的种植，并且是为了建造公路、学校、诊疗所和其他职业教育机构。 通过这些计划，我们已能够在一些地区根除罂粟的种植。 无需指出，我们期待着与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进行最好的合作。 过去我们与该基金的关系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与滥用麻醉品的祸害进行斗争。 因此，我们期待着联合国机构协助我们进行积极的变革，以解决这一严重问题。

关于麻醉品的特别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认识并思考这一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应当为它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开辟新的道路、制定新的计划以及制定产生于现实的新的指导方针的机会，以便使人类免受这一瘟疫的影响，并保证我们后代的前途。 我国代表团要向筹备委员会，特别要向其成

员表示祝贺，因为他们为制定全球行动计划草案和政治宣言草案作出了不懈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需要在深不可测的水中迈出一些重要的、勇敢的步子，以免波浪吞没我们。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南北或东西问题；它面对着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我们应当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相信特设委员会将制定与本届特别会议相称的文件。

我们期待着在我们国家，而且也在世界上看到一个没有麻醉品的社会。我们已下定了决心。我们将致力于与所有个人和国家进行的合作，以便实现这一目标。巴基斯坦政府目前执行的政策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基础的，即必须通过各国间毫无保留地和全心全意地合作来作出全球性的、一致的努力，以便根除麻醉品滥用这一祸害。

赫德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参加在您的领导和指导下的本届特别会议令人非常愉快，并感到特殊的荣幸。我相信我们到这里来是对的。麻醉品贩运和麻醉品滥用这一对孪生恶魔使每个国家都处在危险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受这一祸害的影响——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核超级大国还是小岛国家。这个敌人使我们都成为盟国。

麻醉药品上瘾带来的不是欢乐或宁静；它带来的是痛苦、苦难和悲惨。受影响的不仅是上瘾者；老太太的养老金被抢走，用来支付抢她的那个人吸毒上瘾所需的费用，社会由于麻醉品交易而被扭曲，而变得低劣——这些也都是麻醉品造成的恶果。贩运麻醉品和滥用麻醉品是犯罪的祖师爷。毒瘾迫使上瘾者进行抢劫和欺骗。麻醉品会使上瘾者的行为变得毫无理智，并充满妄想，结果导致他伤害自己的邻居。众所周知，国际麻醉品交易能够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带来巨额利润，现在他们不仅采取欺骗和偷窃的手段，而且还用炸弹和子弹来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以便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简言之，现在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更严重的奴隶交易。

统计数字描绘的是一幅暗淡的图景。1989年世界鸦片生产可能比1985年增加了三倍以上。在欧洲，扣押的海洛因是以同样的速度增加，而扣押的可卡

因几乎增加了四倍。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仅仅从统计数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必然的，但也太容易了。统计数字永远不可能正确地衡量人的痛苦。在许多中美洲国家，遭到遗弃后被迫流浪街头的少年儿童成为可卡因分销制度的一部分。并且变成了上瘾者，结果患上了脑出血和心脏疾病。在我国——英国，海关扣押的非法麻醉品1989年猛增了40%。有一批被扣押的货物中的海洛因是装在糖块里的——每一块糖里的海洛因足以杀死一个儿童。这确实是一个恶梦般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恶梦，而是现实。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是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必须极力处理这一现实。与国家政府相比，联合国也不能作出不冷不热或官僚主义的反应。我们必须找到资金和人力来做必要的工作。正由特设全体委员会拟订的全球行动纲领草案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麻醉品是人人都面对的问题。生产国和消费国必须共同作出努力。实际上，这些措辞使人误解。在减少生产和减少需求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最后这两者必须同时得到解决。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模糊不清。许多所谓的生产国已逐渐产生了严重的滥用毒品问题——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那样，而合成麻醉品，例如氨基丙苯的非法生产却是所谓消费国家里的一个大害。

卡塔赫纳最高级会议表示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决心。我热烈赞成美国、秘鲁、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四周总统提出的倡议。让他们的决心作为我们共同的榜样。

联合国现存的三个毒品问题机构已经在作出大量有益的工作。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禁毒基金）给我们留下了印象，它是国际努力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联合王国每年都对该基金的工作提供定期的捐款，另外还向巴基斯坦、印度、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主要项目提供了总共约1千万英镑的资金。有了更多的资源，禁毒基金就能够做更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帮助执行法律。

但是，在我们看来，对于面临的问题，联合国并没有向所应该的那样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必须在处理毒品问题的各联合国机构当中减少重复的努力，增进协调，并保证适当地利用其资源。

联合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解决毒品问题的所有方面。这个组织应当强有力，有很好的结构，并且有一个专职的负责人。当然，应当有合理的保障措施，以维护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自治权。这一新的机构将负责所有问题的决策。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三个现存的机构并成一个新的机构，进一步裁减，以便更好地迎接挑战。我们没有时间对不同机构责任之间的界线小吵小闹。我们当然也没有资源去浪费在重复的努力之上。

因此，我热烈欢迎大会决定要求秘书长任命一个专家小组，以审查联合国毒品问题机构的结构。我相信，该小组将考虑到在本届会议上所表达的意见。

当然，除了必须进行改革之外，还必须争取更多的资源。联合国现有的毒品问题机构是靠经常预算来资助的，它们缺乏充分的资源来处理不断增加的工作量。我们和其他政府已经提供了预算之外的援助。但是，如果我们要取得胜利，就要求从现有的经常预算当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另外也要求所有会员国自愿捐款，以便进行联合国所确定和管理的项目。

除了同联合国进行合作之外，我还强调必须更好地进行区域合作。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已经强调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种合作，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是我们战略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支持禁毒基金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新的设想，即在非法生产和毒品贩运极为猖獗的世界某些地区采取次区域的办法。但是，只有次区域的各国政府同禁毒基金进行充分的合作，这种态度当然才能够充分地得到执行。

国际合作必须以国家行动来加以补充。这首先意味着会员国应当批准和执行现有的国际公约，我这里特别指的是《1988年联合国反对非法毒品贩运的公约》。我们现在也有立法摆在英国议会面前，这应当可以使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批准《1988年公约》。除此之外，我们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来执行其规定。

第二，在一项国际公约中说漂亮的话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国家立法，让双边和多边毒品协定有实际效力。联合国可以帮助国家起草立法，并确定执行法律的



培训方案以及交流情况的系统。但是，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必要条件是各国政府和议会进行立法的政治意愿。

第三，应当有更多的国家作好准备，就追踪、冻结和没收毒品贩运者的资产的协议进行谈判。对一个被定罪的毒品贩运者，应当没收他的财产以及剥夺他的自由。现在，只要在一个计算机的终端移动，几百万英镑就可以在各大陆之间流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国际协定的网络。在巴黎经济首脑会议上确定的财政行动工作队的报告载有40项具体的建议，包括有关毒品收入以前的所有方面。它对今后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针。

接着，我们必须共同监督在非法生产毒品过程中所用的那些化学物品的交易。其中许多化学物品有合法使用目的，但我们必须防止这种物品被转用来非法生产毒品。《1988年公约》第12条的规定包括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正在欧洲共同体中同我们的伙伴一起努力，以发展一个欧洲系统，来监督某些物质的国内和国际贸易，同时限制对合法贸易的干涉。这将是一个主要的步骤，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全世界的网络，来追踪有嫌疑的化学物质的下落。我们也赞成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重要的倡议，即在政府和生产化学物质的公司之间召开会议。

在英国，我们依靠一系列的执法和公共教育。我们的毒品贩运刑事法规定没收贩运者的财产，这项法律自1987年来就已生效。

我们正在作出努力同其他国家达成互惠的协定，以便在没收毒品贩运的收益方面进行合作。到现在为止，在短短的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达成了13项这种双边的协议。我们期待在今后的几个月里签署其他一些协议。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主动行动。我们欢迎《1988年联合国反对非法毒品贩运的公约》对促进在没收这种交易的收益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明确规定。刚才我们十分感兴趣地听取了西班牙卫生大臣的发言。下个星期早些时候，我将到马德里同他的同事外交大臣探讨我们如何最好地发展我们现存的合作，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在直布罗陀海峡打击毒品贩运。

实际上，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国际上，我们都还没有一个反对毒品贸易的警方合作的充分的网络。自我在一段时间以前首次建议必须设立一个欧洲毒品问题情报单位以来，我们在欧洲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联合王国和我们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伙伴正在友好的首都逐步地增加毒品问题联络官员的数目，但是，我认为进一步合作的范围是很广阔的。

我们的公众教育主动行动包括1985年发起的一场宣传卫生知识的主要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个项目包括全国性的反对海洛因的宣传，主要针对处在危险之中的年轻人。两年前，由于情况有了改变，我们把重点改变为突出宣传通过注射毒品而患上疾病，特别是HIV病毒的危险。今年的运动将在下个星期发起，它将强调服用过量或由于事故而失去控制的危险。

在教育方面，我们也采取了其他明显的主动行动，我认为这也是十分重要的。自1986年以来，我们向英格兰和威尔士当地的教育当局提供了财政援助，任命了“毒品问题教育协调员”，并为教师提供了有关滥用毒品问题的在职培训。在新的全国性课程安排方面，要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小学和中等学校提供有关毒品问题的教育。

一项新的毒品防预主动行动的目标是在那些受毒品威胁最严重，特别是受可卡因和“块克”的威胁最严重的居民区进行合作。将设立当地毒品防预小组，以便对当地的需求和关切作出反应。这里的建议是，面临危险的公民受到的威慑不是遥远的政治家的声音，而是他们自己社区那些他们了解和尊重的人发出的呼声。我们认为，从基层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更有希望提醒普通人注意危险。

正如成员们知道的那样，联合王国同联合国一道将作为世界部长级首脑会议的东道国，会议将于4月9日至11日在伦敦举行。这是1990年国际毒品问题年历史上的第三件大事。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已经被邀请参加会议。

在首脑会议上,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对减少毒品需求的国际承诺,并通过交流技术和经验来加强减少需求政策的有效性。我们还将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可卡因上。我们期望一起找到方式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努力减少对可卡因的需求、生产及其贩运。

根据我们的援助方案,我们计划向四大洲的26个国家提供有关毒品的双边援助。我们正以三个主要方式向欧洲共同体援助方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参加有关毒品方案的其他机构捐款:通过旨在劝阻毒品生产的大规模的乡村发展项目,通过较小规模的不连贯的一揽子援助方案以改进执法和管制工作,并通过有关毒品的教育和戒毒方案。

英国援助的一个重要的接受国是哥伦比亚,我要在这个讲台上全心全意地支持巴尔科总统对他的国家的贩毒集团采取的无畏的立场。我认为,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大家都必须钦佩和赞扬他的力量和决心,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向哥伦比亚提供一揽子实质性援助,包括清除炸弹、人员保护和其他事项的设备和专门技术。我们正在同哥伦比亚政府密切磋商,试图为这一培训和援助定指标,我们同其他捐助国一起谨慎地协调我们的援助,以确保不发生重复。

有些人说,反对毒品的斗争永远不能获胜,当然这场斗争将是漫长和艰难的。一方面,我们面临着毒品贩子牟取暴利的欲望,迄今为止,他们轻而易举地牟取了暴利。另一方面,我们的公民追求更加刺激的人为的兴奋。这些是毒品的贸易的两个强大的发动机,要使它们停止不动是不容易的。但是,承认失败,例如使所有或部分贩毒活动合法化,将使我们所代表的许多人过贫穷和绝望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拒绝这种意见的原因。本届特别会议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我们决心继续加强我们的联合努力,向贩运和滥用毒品作斗争。我希望,正如我已经建议的那样,我们能够就加强联合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机制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能够就改进对现有的国际协议的参加和遵守并在国家一级加强行动达成协议。

正如每一位发言者强调的那样，这关系到无数个人的苦难。我们能够改善他们的前景，我们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其方法是使我们的会议成为一次成功的会议。我们将在这里和今后努力工作，以摆脱这场恶梦。

**邦戈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加蓬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的工作。我们确信，在你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将获得圆满成功。

在整个历史时期和世界每一个地方，与毒品有关的问题总是在不同的时代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尽管能够减轻人的疼痛或改变人的行为的物质长期以来为我们的社会所了解，但它们可能的用途总是由传统的医药所决定的，从而防止了非法贩运和滥用。

不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由于“文化冲击”，利润动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有类型的约束都已经消失，使许多人轻而易举地得到这种东西，从而导致我们大家都意识到的毒品滥用问题。

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这一形势视而不见。国际社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1961年、1971年和1988年公约，这些公约为管制毒品的供应和流动提供了适当的构架，并争取促进各有关方面之间的合作，以便有效地处理非法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这一问题的各种方面。

非洲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在1979年和1980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两项决议，表示了关注和同毒品滥用及非法贩运毒品作斗争的决心。确实，非洲、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受这一现象影响的地区——如果我们根据近几年来所没收的毒品数量来作出判断的话——正成为过境、生产和消费的地区。如果不进行一些迅速、积极的区域合作，这种局势可能会恶化。

加蓬决心采取行动。因此，在1989年5月，加蓬举办了一次全国毒品问题讨论会。作为那次讨论会的结果，政府设立了一个同毒品作斗争的各部间委员会。今年1月，我国政府还举办了一期特工人员培训班，在未来的全国委员会领导下同毒

品贩运作斗争。将特别委托该委员会协调参加反对贩运毒品斗争的各部门的工作，这些毒品无视人类的尊严，它们传播死亡，或永远地毁灭许多面无表情的受害者，他们呆呆地凝视前方，眼睛中流露出无限的悲伤。

行政机构采取的行动在立法机构引起反响。对吸毒处以刑事惩罚的加蓬刑事法典的具体条款将予以修改，使其适合这个问题的实际范围。同时，将开展一场关于毒品危险性的教育运动，因为不了解情况就不能进行预防。

为了在区域一级同这一弊病作斗争，加蓬政府将在友好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协助下于1990年5月举办中非经济共同体关于毒品问题的首次讨论会。这次会议将使我们能够估计地区形势，并将试图制定一项以加强各有关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联合中期和长期政策，尤其通过设立一个中非经济共同体毒品委员会。

尽管加蓬迄今为止没有遇到大规模种植毒品的问题，但自从举办第一次全国讨论会以来我们现在正式地知道，加蓬没有能够避免成为贩运毒品的过境地点。确实，1989年，我们的有关机构没收了几百公斤大麻、大约十公斤海洛因、几百克可卡因和一万五千片精神药物，包括兴奋剂和苯基丙胺。

然而，无论加蓬的种植面积和滥用大麻的情况同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大数字相比是多么地小，但事实仍然是，它在社会上对我们造成的威胁同癌症给人造成的威胁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加蓬从这一立场上满意地看到去年10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关于毒品问题的会议期间以及最近在卡塔赫纳举行的会议对以其他得到销售保障的作物替代古柯所作的承诺。

但是，这一倡议虽然是解决问题的开始，然而却未能解决这些产品的偿负价格的问题。如果贸易条件的恶化仍然是我们经济中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我们如何去劝说农民——对他来说种植古柯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去根据这一逻辑生活？这一罪恶的浪潮是否仍然能够制止？这还是个问题。我们则仍然相信，胜利在于我们要具有战胜这一魔鬼的决心。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要取得成功就一定会成功。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追踪从生产者到销售者，一直到坐在他们成百万麻醉品美元——每一迭钞票都标志着一个夭折的生命和破碎的希望——堆上的毒品大王之间的纽带。但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条纽带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或许是最有害的环节，因为它具有体面的外表——即那些为其根源和后果是罪行和暴力的金矿洗钱的银行家。

在这一点上，南方的国家，尤其是亚热带非洲国家——它们今天正表现出一种非常具有传染性疾病的前兆——必须与这些毒品的生产国、中转国和目的国政府建立真正的合作。这是绝对必要的。缺少这种必要的合作，会严重破坏每个国家各自所作的努力。事实表明，战胜这种灾难的斗争如果只是零星地进行，而让这一魔鬼具有在世界上那些没有对付这种灾难防御手段的新的地区再生和兴旺的余地，这场斗争是不会成功的。

因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汇合各种努力，各国才能够根据1987年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维也纳会议所制定的多部门方案采取持续和有效的行动。因此，加蓬将饶有兴趣地欢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能够给以它的援助，以便制定这些国家项目，打击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的活动。

麻醉品生产和滥用除了对人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害之外，我们无须再提醒大会注意还有其他同样有害的因素，这些因素从近期和长期来看，会促成环境的破坏。实际上，似乎在安第斯地区种植古柯造成每年有20,000多公顷的热带森林被砍伐，而由于古柯树丛是种植在山坡上，土壤极为迅速地流失。此外，农民在利润的欲望的驱使下，似乎越来越愿意把古柯变成柯卡因，为此使用生产所需数量的煤油、硫酸、生石灰、丙酮和碳化物，溪水与河流及其沿岸受到了污染。

这说明了打击毒品贩运斗争与重新考虑发展需求之间的联系。

各位刚刚听到了加蓬的呼声，这是发自一个向所有受到这一幽灵折磨的家长一样的父亲心灵中的呐喊，对这一幽灵的阴影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决心保证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各自国家中的年青人将能够怀着信心和安宁展望未来。

因此，既然向邦戈总统所指出的那样，“正义是神圣的”，我们就需要教育我们的年青人热爱和尝试努力，这是他们能够掌握自己命运、摆脱毒品所提供虚无天堂的唯一手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赞赏其代表今天上午10时10分坐在其席位上的下列国家：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比利时、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以色列、牙买加、日本、黎巴嫩、马拉维、马耳他、挪威、巴拉圭、葡萄牙、卢旺达、圣卢西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苏里南、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也门。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理解。

下午1时零5分散会。